

# 书店里的时光记忆

周洋

“住在伦敦，更谈不上买到什么好中文书，闲中只好逛洋书旧书市，聊以解闷。这里旧书铺古玩店很多的长巷短街原是灰蒙蒙的，艳阳下看着委实寒酸，秋雨一来，反倒有些韵味。”这是董桥笔下的书店风景。

“书市是最自由的读书天地，是文化环境、文化气氛最重要的成分。这些地方活跃，就说明文化气氛活跃，读书的人多。因为文化气氛首先表现在读书气氛上，而不是表现在歌舞厅中。”这是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的由衷感慨。

“成都比重庆有趣就在这里——有旧书摊儿可逛。买不买的且不去管，就是多摸一摸旧纸陈篇也是快事啊。”老舍眼中渝蓉两城的高下全赖旧书摊赋能。

凡此种种，还有很多。譬如周作人的《厂甸》、阿英笔下《城隍庙的书市》、戴望舒《巴黎的书摊》，都是脍炙人口的书话名篇。其作者，无一不是资深书虫，这些书集市、书店书摊，正是他们魂牵梦萦的所在。流连忘返之余，不忘写下书市展痕的点点滴滴，把他们在书店度过的快乐时光分享给更多的爱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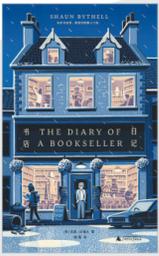
## 旧书肆里的温情记忆

其实，写下与书店有关的文字，从来就不是名作家的专属领地。很多报纸的副刊、杂志的专栏里，都会有普通读者写下的书店见闻。谓予不信，请看《旧时书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收录了94篇这样的书话美文，全部从近代报刊文献中钩沉辑录而出，勾勒出那个年代大小书店书肆的全景图。书分“申城书肆”“故地书肆”“城外书肆”三辑，涉及上海、北京、南京、广州、苏州、重庆等地的淘书见闻，其中颇多可读可赏之有趣文字。且看，发表于1933年的这篇《上海的旧书店》：“这些旧书店，好像终年都是兴隆的样子……一个人要出书，大概已是困窘不堪，所以旧书店老板以逸待劳，乐得榨你一样。”而另一篇《买旧书之门坎》则从买书人的角度写道：“未买之先，须将书名、著者姓名、何书局出版，及最近出版之日期，详细抄于纸上。然后往购，其中尤以最近出版日期为紧要，因旧书店恒以一千八百数十老书出售，偶一不慎，即受其愚。”两相对读，旧时上海书店买卖双方的一番博弈宛在目前，彼时社会百态之繁盛亦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对于爱书人来说，书店绝不仅仅是一个买卖商品的所在，它可能承载着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又或者成为我们感受知识分子人格魅力的一处社交场域。日前读到周立民的文章《从一张发票说起》，从巴金先生1978年在上海书店的一张购书发票，牵引出巴老与魏绍昌的友情与他的二叔、大哥的亲眷，更有与上海书店店员陈克希、许志浩之间的互动交往，十分温暖感人。这让我想起另一则和购书发票有关的故事，即周立民《春未老，书难忘》（文汇出版社出版）中的一篇文章《沈从文传》里的那张发票。周立民拥有美国汉学家金介甫教授代表作《沈从文传》1992年的湖南文艺版，这是他在大学期间买到的第一本书，地点是在大连天津街的新华书店，夹在书中的购书发票唤起了他26年前读大学时代的美好记忆。这样的书话记忆，在这本书中俯拾皆是。他在镇上供销社文化柜台里买到张爱玲的《传奇》，在复



《书会说话》  
顾真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店日记》  
[美]肖恩·白塞尔 著  
顾真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店漫游：一段书店与文学的寻访之旅》  
[西班牙]豪尔赫·卡里翁 著  
侯健 张琼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书店漫游：一段书店与文学的寻访之旅》  
[西班牙]豪尔赫·卡里翁 著  
侯健 张琼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旦大学北区宿舍外的小书店隔三岔五拎回一包书；在沈阳北方图书城和广州的小古堂旧书店，先后买回两本《戴望舒文集》，用他的话：“尽管家里已有一本，吃着锅里望着盆里，还是不想放跑这一本。”

对书如此情意绵绵爱不释手，似乎还嫌不够，“我还是喜欢摸到书的那种实在的感觉，就连书店里的那种特有的霉味，对我都有特殊的功效”。呜呼，这让我想起四川作家朱晓刚的一本书的名字——“书店病人”。这一群体对书店的挚爱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恨不能天天徜徉在书店里。

## 那些精明的传奇书商们

不过，说到书店店主和买书人的关系，却并非只有《查令十字街84号》一书所描写的那般温情脉脉。既然有“高冷范”的买书人，就会有“毒舌型”的店主，苏格拉底最大的二手书店掌柜肖恩·白塞尔就是一例，他的书店名称就叫“书店”（The Book Shop），开在威格敦小镇上。肖恩隶属那种极富个性的书店老板，只需看一下他的“爱憎表”，便可略知一二。他把乔治·奥威尔的《书店回忆》奉为圭臬，在他自己的著作《书店日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每月的开篇都要引上一段。而他坚定反对的，是风行于当下的各种电子阅读器，一台台猎枪射碎屏幕的Kindle，成为他店内最醒目的装饰物。

在肖恩18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缘让他他在威格敦小镇上邂逅了这家名为“书店”的书店。那时的店主是年迈的书商约翰·卡特，而他还只是个即将走进象牙塔的准大学生。看到堆满书籍的橱窗，他对朋友断言：“这家店一年之内必定倒闭。”结果12年过去，“书店”仍在经营，年事已高的卡特需要物色一位接班人。有嗜书潜质的肖恩顺理成章进入他的视野，靠着银行贷款，在他31岁那年正式接手这家书店。卡特扶上马还不忘记送一程，热心地陪他去客户家里收书，手把手传授他生意经。此时他才明白了乔治·奥威尔的忠告：“别以为二手书商的世界是一曲田园牧歌——炉火烧得很旺，你坐在扶手椅上，搁起穿着拖鞋的脚，一边抽烟一边读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与此同时，络绎不绝往来的客人个个谈吐非凡，在掏出大把钞票买单前还要同你谈一段充满智慧的交谈。真实情况简直可以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因此，我们在书中读到肖恩周游各地收购旧书、访寻珍本；出入陌生人的客厅和书房，见证人与书的相聚与分离；请教上一个时代硕果仅存的书林前辈，与层出不穷的奇葩顾客打交道，也和忠实的老主顾维系着悠长而稳固的纽带；管理特立独行的个性店员，也时不时抚弄一下永久店员黑猫“船长”；应对电商冲击之下的经营窘境，也乐见更多的书店和文艺群落出现在周边出现。这些足以慰藉心灵的书店故事，其中所蕴藏的不仅是书的聚散、人的离合，还有属于实体书店的黄金时代逐渐由盛转衰走向落寞的叹息，更有不易为人所察觉的一点，二手书店赋予威格敦小镇的书香气息，浸润着社区感人情味，在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格局下，正是人们需要小心呵护并倍加珍惜的一份真挚情感。

肖恩·白塞尔的《书店日记》及其续集《书店漫游》，一经出版就成为英伦书店业的年度黑马，也深刻影响了这两本书的中文译者顾真。顾真为自己的新书取名《书会说话》（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这灵感来源于《书店漫游》中一位顾客的感叹：“真希望这些书能开口说话，跟我们一起讲它们看过的事情。”一句“藏书说到底藏的是故事”，让他笔下的古书旧籍都成了能说会道的故事大王，向读者道出鲜为人知的书人书事。我想，顾真心目中理想的二手书商应该是A.S.W. 罗森巴哈那样的殿堂级人物，因为在他看来：“罗森巴哈博士有一种能力，擅长把优秀的顾客变成亲密的朋友，让一笔寻常的生意充满人情味，仿佛是他的好意。书商和藏家之间从来不是纯粹的买卖关系，而是可以相互砥砺的知交。”

自小浸淫书海，对各种版本信息烂熟于心，后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辛卯，将天时、地利、人和集于一身的罗森巴哈，确实配得上“有史以来最伟大书商”的盛名。他的著作《猎书人的假日》《书与定价》《早期美国童书》，是书话中声名远播的经典。这些传奇经历足以在他去世十年后，支撑起一部600多页的《罗森巴哈传》。他在珍本书拍卖场上所向披靡，有“拍场上的拿破仑”之称，他的名字频频出现在报端，一时间成为“出了不起的价格买不起的书”的代名词。他的传奇经历启示我们：一个伟大的书商，既仰赖天赋，亦是后天修炼而成。

## 满世界逛书店的乐趣

有人把经营一家书店作为毕生的事业，也有人把走遍世界各地的书店作为旅行的乐趣。《书店漫游：一段书店与文学的寻访之旅》的作者豪尔赫·卡里翁就是如此。他是一个文学发烧友，也是一个醉心于逛书店的专栏作家。用他的话来说：“在书店这个世界中的旅行是靠阅读完成的，在这里甚至连时间都会变得缓慢，而且进行这种书店漫游压根儿无须有护照。如果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遍世界上所有书店的话，就可以感受到书市尚存的文化气息，因为从浪漫主义时期到现在，在墓地、建筑遗址、咖啡馆、图书馆以及后来的电影院、当代艺术博物馆一样，书店一直是，将来也仍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场所。”

从1998年开始的差不多15年间，卡里翁把旅行目的地指向“这世界上最好的、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或是最古老的书店”。旧金山的青苹果书店、巴黎的泡沫书店、伦敦的约翰·桑德书店、里斯本的贝特朗书店、伊斯坦布尔的鲁宾逊·克鲁索389书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永恒旋律书店……甚至不惜坐飞机24小时抵达迈阿密，只为去那里最漂亮的书店“书与书”打卡一游。他在这些书店里走走停停，取一张名片，买一本旧书，或者只为歇个脚、蹭个网，顺便与店主聊两句，很放松也很随意。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依赖于手机屏幕和电脑键盘的阅读将会越来越普遍。由此带来的变化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书店可能转眼间就会变成一家快餐店或咖啡馆，正如卡里翁笔下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书店，创立于1924年，经历过无数风雨，如今却已被一家麦当劳所取代。“这个曾经和阅读息息相关、经营图书的地方，渐渐地变成了一个被蛋白质和白糖充斥的快餐店的地方。”

事实上，希冀所有的书店永久地存在下去，既不可能，也不必。你可以把书店看作孕育友谊和爱情的浪漫之地，也可以把它视为塑造精神世界和追溯思想源泉的神圣之地。或者，解构它，给它祛魅，仅仅当作一笔生意的交易所。甚至它消亡，退隐于历史的角落，这都在情理之中。重要的是，你拥有过一段关于书店的快乐的时光记忆，这就足够了。

# 在太行山讲白夜的书

卫建民



卫建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



白夜部分著作书影

初夏时，我在山西长治学院中文系给新闻专业的学生讲课，主要内容是漫谈名记者白夜的人物特写。我用“新闻性、文学性完美结合的美文”概括我学习白夜写作技巧的体会。

白夜（1919—1988）是江苏沐阳人，青年时期就在苏北地区参加党领导的新闻队伍，曾任《淮海报》记者、《苏北日报》副总编辑，渡江战役时，他曾率一个记者采访组冒着敌人的炮火在前线采访。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白夜以记者、诗人、作家的身份在苏北一带活动，他写的《十里风光》《黑牡丹》享誉一时，苏北地区的老人还都记得。

1952年，白夜奉调北京，在人民日报社工作。刚进京时，时任社长的邓拓请江南来的新人在萃华楼吃饭。20多年后，白夜写了几篇怀念邓拓的文章，其中的《魂兮归来》发表于1986年5月16日的《文汇报》。这篇情深意重的回忆文章，是当时的总编辑马达同志亲自向白夜的稿子，在特殊的日子用报纸一个整版发表纪念邓拓的文章，这两位苏北的新闻老战士心中自有默契的。又过了20年，我在文汇报大厦见到马老，谈起他当年向白夜的稿子的往事，马老马上叫人去取一本他的作品集送我。

白夜在人民日报社当编辑、记者，多年上夜班，个人写作的时间有限，但他还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之请，为青年人的健康成长成长写了一本思想修养方面的小册子。

社会恢复正常秩序后，白夜到了退休年龄，他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写作数量猛增。退休，对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来说是他的第二春。在当年的《新闻战线》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白夜的人物特写。他把新闻和文学嫁接在一体的美文，深深地吸引了我。在整个1980年代，我注意阅读他发表在报刊上的特写，可以说是白夜迷。后来，我认识了他，承蒙警教，学到了一些写作技巧。在读书方面，他说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语言好，我就去买罗大冈先生的译本，读过好几遍。他说王尔德《莎乐美》有多美，我就去图书馆借来读。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他讲起六朝文和《西厢记》，大赞古典的语言美。他也只愿意写美文。他对我说：“我写了美，就是鞭挞了丑。”他又有洁癖，曾说“我不愿写肮脏、丑恶的东西，我怕污了自己的笔”。

在讲台上，我给年轻的大学生讲白夜写人物的经验，主要是从新闻业务方面来讲。白夜写过60多个中外一流人物，每篇都没重复，在当代记者中是罕见的。我给年轻的学生讲课，是我学习白夜写作技巧的体会传导到莘莘学子身上，但不知他们能听懂多少？是不是感兴趣？但一个半小时的讲解，最保守的估计，他们一定知道了曾经有一位新闻界的前辈写过什么。愿意把新闻当作未来职业的学生，也许就会注意读白夜的书；喜欢写作的学生，也许对衡文就有了标尺。

白夜生前出版过十几种著作。《黄花

集》是收入“当代中国记者丛书”的其中一本。《天桥》是一部具有新闻史、社会学、文学史意义的不朽名著。这部著作，是他退休和老伴沈颖共同去天桥地区采访的成果。读书人都知道，张次溪有一本记天桥的书，曾由知堂等人序写，1949年后以《人民首都的天桥》名出版。张著的价值，主要在风俗史、地方志。白夜夫妇采访天桥时，旧时代在天桥一带安营扎寨讨生活的老艺人都还在世，白夜以传统的采访手段，历时三年，采访500人次。上午采访，下午就写作，原汁原味、新鲜热乎地保存了老艺人对待生活、悲欢交集生活的回忆。当然，白夜的著作不是讲述者的录音整理，而是文学的再创作：事是真的，文是美的。他还采访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军管会派往天桥的第一任区长，一位老红军。书的后半部分内容是新政府对旧天桥的改造。

白夜还写过历史长篇小说《杨家将演义》、当代长篇小说《乱世》。这两部书，出版社没选，出版后影响小，远没有他的“影”（《剪影》《留影》《侧影》《心影》《掠影》）字的人人物特写影响大。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有眼光的出版家能重新发现白夜这两部长篇的真正价值。

白夜去世后，我给广东的《随笔》杂志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标题是“我没有白活”。这句话，是在他和医院动手术后，我去医院看望，他亲口对我说的。原话是：“我写过书，我没有白活。”这是他自来到日不多后最后的话。

1900年6月22日，封藏近900年的藏经洞再次被开启，这是敦煌文献流散世界的开始，也是敦煌学成为世界学问的开始，更是吾国学人满世界寻找敦煌的开始。敦煌文献的流散，让人心伤无奈；但寻回敦煌的史诗历程，更可歌可泣。荣新江先生的《满世界寻找敦煌》便全景式展现了近代以来敦煌文献的流散史，以及中国学人百廿年间对敦煌的艰苦追寻，给人以启迪，更给人以力量。

作者自大学阶段起便在张广达、王永兴等先生的培养下走上了以寻找敦煌、研究敦煌为志业的学术之路。但敦煌之于他，不仅是个人兴趣，更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敦煌是近代中国的缩影。近代中国的落后、国人的无知，造就了敦煌文献的悲剧。但当中国最先进的学者听闻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掠走敦煌宝物后，在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很快醒悟过来。他们一方面将尚留在藏经洞的8000卷卷子运回学部，另一方面也通过各种途径复印、刊刻伯希和等所得“精要之本”。在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的推动下，掀起了满世界寻找敦煌的第一个高潮。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走出国门，到欧洲抄敦煌卷子渐成最顶流的学问。抗战爆发前，向达、王重民等先生便在英法开展了大量工作。经过努力，所得甚多，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了法藏敦煌文献一万余张照片，文献共计1500余种。这是中国学者满世界寻找敦煌的第二个高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法等敦煌文献主要收藏国陆续以缩微胶卷的方式向世界公布了自己的收藏，但受限于当时馆藏机构的技术能力以及整理和研究能力，各国公布的都是“部分”而不是所有文献。改革开放后，包括敦煌学在内的中国学术迎来了春天。以荣新江为代表的中国敦煌学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重新开启了寻找敦煌之旅。

除了让敦煌文献以“文字”和“影像”形式回归，荣新江还曾努力推动“实物”回归。在书中就有四次提及，他找到了伯希和等人掠夺中国文物是违背国际法的证据，甚至还曾和英国律师严肃讨论过追回中国文物的策略。

本书基于面向中国丝绸博物馆公众的讲座而成，这种形式奠定了本书通俗性和可读性的基调。作者讲故事也是行家里手，有时甚至一两个词，亦可让人读得热血沸腾。比如2014年，荣新江经过多次尝试，方才获得第一次到甘肃武威探访秘笈的机会，他讲到，“这和我一开门就冲到楼上赶紧看，要利用所有的时间来看”。一个“冲”字，把多年追求而不得的无奈、费尽周折突然获允的激动、试图尽快一窥秘笈真容的急切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书虽通俗，却又富含学术，想要真正读懂并不容易。根据学者粗略统计，单是书中所举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精华便多达500余号，每一件都是理解古代历史乃至近现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更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所配图也值得留心，因为其中有一些是作者早年单独申请的，如S.9213A、B便是其中之图，此号虽已于IDP网站公布，但和此图相比可以发现S.9213A右上角的一丝残纸已经不见；又如日本国会藏《金晨夜十方忏》也是少见的彩图；Jx.17433《弘法藏大般若经》的照片虽在《俄藏敦煌文献》中有彩色照片，但本书提供的照片更加清晰；类似的还有Φ.229《景德传灯录》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彩图只见于印数极少的内部图录，世界学人甚难一见，如《唐仪凤二年西州都督府北馆厨厨文》仅见于1990年印制的《古典籍下见展览大人礼会目录》。

作者在本书中不仅追忆了过去40年的行脚，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总结过去，提出了学术前进方向。

专题研究方面，主要是针对具体文献，点出了可以切入的角度和讨论的话题。如Jx.234《圣游记》之

# 敦煌，如何被寻回？

武绍卫

前学者认为是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残卷，但荣新江注意到“这件的字体比较鲁莽”，故认为大家可以继续讨论；又如MIK.III.520《文选》卷背驮罗萨斯德教风格的神像头部被毁，所以画虽然不完整，但很有继续研究的价值，他提出可以从图像组合角度进行探究。

个人规划方面，主要是继续增订和更新敦煌寻宝图。比如更新《海外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目录》（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卷））；推动翻译《法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同时增订和更新英藏法藏目录；找时机撰写《国宝与赝品》，为文献辨伪提供支持；总结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发表后几十年来西域文明史研究的新成果，撰写《西域文明史概论新编》等等。

集体推进工作方面，大致有三方面工作。第一，已公布的文献需要重新整理，比如全力推进“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出版适应现代学术需要的《敦煌文献全集》；组建团队，整理已有大谷文书以及中国国内馆藏吐鲁番文书的全部彩图，把所有文书重新整合，并予以全新校录；吉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档案是敦煌学学术史的一大宝藏，需要尽快整理。

第二，未公布的文献，需要推进馆藏单位公布。比如俄罗斯藏克罗斯科夫、奥登堡、马洛夫收藏品（主要是吐鲁番文献）、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吐鲁番文献、芬兰赫尔辛基藏吐鲁番文献以及天理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书等，需要继续大力探访，尤其是推动公布。新疆档案馆是个大宝藏，其与近代敦煌吐鲁番学相关的学术资料也值得打撈。

第三，历史上丢失的文献和文物，需要继续追寻。如叶昌炽所见31页的梵文（荣先生认为可能是《兰文》）写经、沮渠安周碑、大谷探险队留在旅顺但后来不知所踪的八件文书、滨田德海旧藏的《神会语录》《历代法宝记》等多件重要文书。

学问如积薪，代代相传。自罗振玉、王国维以至向达、王重民，再到荣新江，120年间中国学人前赴后继，满世界寻找敦煌。这是一段充满坎坷但又充满激情的岁月。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满世界寻找敦煌》  
荣新江著  
中华书局出版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敦煌道教卷子